

刘伯奎◎著

汉语交际

一本通

——对外汉语教学高级读本

Chinese Communication

All in One

Advanced Reader for TCSL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刘伯奎◎著

汉语交际

一本通

——对外汉语教学高级读本

Chinese Communication

All in One

Advanced Reader for TCSL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交际一本通: 对外汉语教学高级读本 / 刘伯奎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668 - 1007 - 6

I. ①汉… II. ①刘… III. ①汉语—口语—对外汉语教学—自学参考资料 IV. ①H19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86726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62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4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汉语交际的三个学习层次（代序）



所谓汉语交际，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从未进入学校接受系统学习的人，甚至一个发声器官有功能障碍的人，也常常能创造出自己的表达方法与技巧，与身边的人（用汉语）顺利地进行交流沟通。这一点，也许应当视为以不同语种为母语的人类所共有的本能。

然而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人来说，要想用汉语与他人顺畅无阻地交流，显然就需要通过目标明确的后天学习了。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汉语交际的后天学习，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就像中国人学习英语一样，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人来说，首先应当认读汉语的字、词，进而掌握汉语连词成句的构成规则（即语法），再进而学会组句成篇。这种学习可称为学校学习层次或规范学习层次。这种学习能使具备运用汉语规范地表情达意的能力。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一个人的汉语能力达到了这一水平，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具备了运用汉语与他人进行交际的能力。因为语言交际是一个与交际对象运用话语或文字进行“双向交流”的过程，是一个与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发送、接收与破译”的过程。在这个“发送与接收”的过程中，不仅始终需要准确理解语言信息的字面意义，还需要精准把握附加在字面意义上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等，否则在交际过程中就难免产生误解、冲突，导致沟通失败。

这就需要接受第二层次的学习，这一层次不妨称为生活模拟层次或贴近应用层次。

有一些在汉语环境中已经把英语学到相当高等级的人初次进入英语世界时，依然会使用“洋泾浜”英语，出现用语不当的情况。这就涉及英语学习的第二层次的要求，因为任何语言种类无不是在具体的生活绵延中形成的。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很自然地会逐步形成一些约定

俗成的、格式固定的习惯用语，这种用语源自生活却往往随生活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因而往往对语法规则的遵守并不严格，如果单从字面中规中矩地进行理解，可能与其在实践应用中的含义差别很大甚至南辕北辙。

汉语交际学习与此同理。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光是规范地学习汉语的组词造句、连句成篇，有时能使自己用汉语表情达意的能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要想在实践中达到应用自如的水平，还需要养成一种习惯，即把“中规中矩的规范表达”转化为“不固守规则地贴近日常生活应用”的表述，从相对单一的“表情达意”拓展延伸到“叙事、状物、抒情”的多种应用。这就需要在“学校系统化学习”的同时，“贴近生活实践学习应用”，这样才能具备用汉语与他人进行顺畅交流的能力。

语言交际的第三层次是最高的要求，这一层次可以称为应用实践层次或者用语文化层次。它要求一个人不但能够规范地进行语言表达，熟练地进行语言表述，而且能够贴切无误地运用该语种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即语言交际）。这就需要在汉语交际中能够精准地把握交际场合，把握交际语境，以及把握交际对象在其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精神文化背景的个性化特点。通俗地说，就是训练一个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包括常年生活在国外，已经不太能够熟练使用汉语的中国人），在汉语交际中所用的话语能够达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遣词造句的水平，也就是指导一个人，使其交际话语在他人听来，就和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汉语交际一样。

有一则非常有趣的实例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对于一个不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什么叫作把中国话说得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进行汉语交际。

2014年3月13日，在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对外记者招待会上夸赞直接用中文提问的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密欧时说：“你的中文说得很流利，也很标准，我听懂了。”吉密欧也学会了中国人的谦虚，总理称赞他时，他笑着向总理摆摆手，说道：“哪里哪里。”

我们不妨从不同角度来认知这段对话。

从一般语义角度来理解，吉密欧的回答可以说是莫名其妙。对方夸你中文说得好，你可以接受夸赞并婉转地表达谢意，或者谦虚地说自己中文说得还不够好，回答“哪里哪里”是什么意思？是不知道自己“说得好”好在哪里吗？

如果从一般语法角度来理解，就更费劲了。“哪里哪里”的语法成

分怎么分析？哪个是主语、谓语、宾语？哪个又是定语、状语、补语？

但是，一旦转到文化用语层次，可以说，随便问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甚至问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能心领神会。

这就是语言应用所具有的民族精神文化特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这一特点几乎不需要特别关注并专门去学习，但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人来说，这就成了汉语学习的最高层次——用语文化。

据报道，这位能够随口说出“哪里哪里”的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密欧先生，已经在中国工作9年了。

《汉语交际一本通》的副标题之所以命名为“对外汉语教学高级读本”，是因为其目标着重于探讨汉语学习第三层次——用语文化。本书的读者对象为：汉语不是其母语但已经基本掌握汉语的语法和词汇，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汉语交际能力的人。

刘伯奎

2014年3月12日于上海嘉定寓所



目 录

汉语交际的三个学习层次（代序）[1]

第一章 汉语是“会导致智力混沌”的语言吗

——汉语构成的文化特点研究 [1]

第一节 汉语构成方式及其认知角度的把握 [2]

第二节 汉语交际研究首先应当选准切入角度 [7]

第二章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套亲情近乎”

——汉语交际的大文化背景研究 [13]

第一节 中国人喜欢“套亲情近乎”的原因剖析 [14]

第二节 中国人喜欢“表示谦虚”的原因剖析 [17]

第三章 学习语言交际可以只关注日常交际吗

——汉语交际的内涵及其主干项目研究 [26]

第一节 汉语交际的内涵界定与把握 [26]

第二节 汉语交际主干项目的特点分析 [27]

第四章 汉语交际中的话语是如何“轧制”而成的

——汉语交际的过程控制把握 [36]

第一节 语言交际中告知、论证、鼓动对方的用语规则 [37]

第二节 语言交际中肯定、夸赞、迎合对方的用语规则 [46]

第三节 语言交际中婉拒、化解、转换对方的用语规则 [52]

第四节 语言交际中贬斥、否定、驳斥对方的用语规则 [58]

第五章 语境是怎样由要素构成的

——语境构成的系统把握 [65]

第一节 对于传统的语境“二分法”的反思 [65]



第二节 语境四类要素有机合成的理论确立依据 [68]

第三节 语境理论一纲三目框架的构建 [72]

第六章 语境四类要素的个性化构成特点

——语境构成的细部认知 [80]

第一节 人境类要素的特点与把握 [80]

第二节 心境类要素的特点与把握 [92]

第三节 情境类要素的特点与把握 [104]

第四节 物境类要素的特点与把握 [115]

第七章 语言交际场合为什么必须分类把握

——话语行为与场合关系的能动把握 [127]

第一节 怎样把握公开场合与非公开场合 [128]

第二节 怎样把握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 [131]

第三节 怎样把握职业场合与非职业场合 [134]

第四节 怎样把握交际场合与非交际场合 [137]

第五节 怎样把握高雅场合与通俗场合 [140]

第六节 怎样把握友情场合与亲情场合 [143]

第八章 共知成分在汉语交际中的应用价值

——汉语交际构成认知之一 [146]

第一节 语言交际研究中的共知成分 [146]

第二节 共知成分对语言交际的客观性影响 [149]

第三节 共知成分对语言交际的主观性影响 [150]

第九章 标记语在汉语交际中的文化含义

——汉语交际构成认知之二 [154]

第一节 汉语交际中标记语的应用功能 [154]

第二节 汉语交际中常用标记语的种类把握 [157]

第三节 汉语交际中标记语实例剖析举枚 [166]

第十章 汉语交际中应当如何“用词”

——汉语交际构成认知之三 [206]

第一节 人称词的主要类别 [207]

第二节 人称词的使用规则 [214]

第三节 动词、形容词、副词的选用规则 [218]

第四节 量词的选用规则 [220]

第五节 指示词语的选用规则 [225]

第十一章 汉语交际中应当如何“造句”

——汉语交际构成认知之四 [232]

第一节 影响造句的多方面因素 [232]

第二节 句型构建在语言交际中的三重“反比例关系” [236]

第十二章 汉语交际遵守着什么样的“文化原则”

——汉语交际文化层面把握之一 [240]

第一节 关于“合作原则”等几项原则的对比综合思考 [240]

第二节 关于汉语文化语用（总）原则制定的思考 [265]

第十三章 汉语交际中的语境调控与用语保证

——汉语交际文化层面把握之二 [272]

第一节 怎样在语言交际中避免观点对抗 [274]

第二节 怎样在语言交际中避免情绪对立 [278]

第三节 怎样在语言交际中实现气氛和谐 [282]

第四节 怎样在语言交际中实现情境交融 [287]

第十四章 汉语交际中的用语差异与用语冲突

——汉语交际文化层面把握之三 [291]

第一节 交际用语差异与用语冲突的理论界定 [291]

第二节 导致交际用语差异的原因与分类把握 [292]

第十五章 汉语交际必须重视用语宽容

——汉语交际文化层面把握之四 [301]

第一节 关于用语差异与用语冲突的辩证思考 [301]

第二节 用语对策的制定规则 [303]

参考文献 [308]

后 记 [309]

第一章 汉语是“会导致智力混沌”的语言吗

——汉语构成的文化特点研究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名叫亚瑟·亨·史密斯的美国传教士在他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在对汉语作了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之后，得出了“汉语会导致智力混沌”^①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100多年来，他的观点对于中国文化界一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例如，致力于“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鲁迅先生在其逝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这样的影响在汉语研究界同样持续存在，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不断地重复着史密斯对汉语的批评观点。

本章试从汉语构成与传统精神文化、语境要素合成的对应关系的角度，对汉语交际的应用特点进行重新思考，并以反驳史密斯的“汉语会导致智力混沌”的观点为出发点，研究汉语交际的特点。

汉语作为世界民族语言之林中的一个分支，其在应用实践过程中，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与其他民族语言在交际运用方面的共性特点，同时又在交际形式等方面表现出其他民族语言交际所不具备的个性特点。

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对于汉语构成体系的本质认知在某些方面始终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同时也由于在汉语交际研究的切入角度方面至今还存在着某种不够贴切的情况，因此，要把握汉语交际的特点，就必须对“怎样贴切评价汉语语言构成方式及如何调整其评价角度”的问题进行思考。

^① [美] 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气质. 张梦阳, 王丽娟译.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5. 57.

第一节 汉语构成方式及其认知角度的把握

汉语的构成，是以单个的方块汉字所记录的音节和逐一对应的四声声调为其基本形式，注重词序排列，由字组词，再组句，再成段，再成篇。这种构成方式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两大特点。

一、汉语构成的两大基本特点

汉语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和过渡的漫长历程。甲骨文时代几乎全都是单音节词；至西周时，金文中开始出现一定数量的双音节词；再至《诗经》、《左传》、《史记》时，双音节词显著增加；唐、宋以后，汉语逐渐以双音节词为主。

（一）通过词序以及单词字序排列变化来调整语义

时至今日，尽管双音节词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汉语中单音节词的运用仍很频繁。例如：

你有病吗？

宝宝饿了。

当时我已身无分文。

除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以外，三音节词、多音节词在汉语中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成语、俗语、歇后语等，如狐假虎威、众人拾柴火焰高、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等；另一类是外来词，如摩托罗拉、麦当劳等。

汉语中，由三个及三个以上单字组成的词，基本上表现为固定搭配，其语义与语用均趋向明确稳定，在汉语交际过程中，一般无须过多地关注其结构内部的变化。

因此，以双音节词为主，同时仍大量使用单音节词，并通过词序的变动以及字序排列的变化使词组成具有不同意义的句子。这是汉民族语言的第一个特点。

（二）汉语缺少句型构建的诸多语法规则

关于汉语的这一特点，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他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中作了总结。在该书第十章中，他曾特地举例说明汉语没有文法规则的缺点。

2001年7月4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在“读者看法”栏中，有人发表署名文章，复述了史密斯对汉语的批评并表示认同。文中写道：

“……著者以英语的文法标准批评汉语道，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没有性别之分，没有主宾格，形容词没有比较级，动词不受语态、语气、时态、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动词没有可以辨认的区别。”

不仅如此，这位作者还抄录了史密斯的原著中所举的例子：

“……单音节的 Ta，从整体意义上足可以看作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示形容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的证人出示证词一样，按以下方式描述一场殴斗（说明：《中华读书报》上的引文中，以上文字没有抄录，本文作者在转引时补充加入。以下为《中华读书报》上的引文）：“

‘Ta（他）有一根棍子，Ta 也有一根棍子。Ta 狠命地打 Ta，Ta 也狠命地打 Ta。如果 Ta 打 Ta 像 Ta 打 Ta 一样的狠命，Ta 就杀了 Ta，而不是 Ta 杀了 Ta。’”

引文还引用了史密斯的一句评价：

“简直不知所云。”

汉语的单词在使用中，没有主宾格、比较级等语法方面的变化规则，这是其构成方式的第二个特点。应当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两大特点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汉语应用的基本状态。而正因为这两大特点的存在，汉语在使用中确实显得缺少系统化的规则以供精准把握，所以尤其是对于以汉语为外语的人来说，掌握汉语的应用特点，有时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困难之大，可以以俄语中的一则成语为证：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

其中，“КИТАЙСКАЯ”意为“中国的、中国人的、汉人的”，“ГРАМОТА”意为“识字、常识、基础知识”；然而，当这两个单词搭配在一起时，就构成了一则成语，其表达的意思即“很难懂的东西；不可解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①。

汉语以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为意义的基本单位、注重通过词序排列来明确语义的特点，有时确实使得汉语在运用时略加变动就会导致语义改变，甚至语义大变。下面这则典故是一个典型案例：据传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率领湘军围剿太平军，曾因屡吃败仗，在向朝廷的报告中沮丧地写下了“臣屡败屡战，但屡战屡败……”的文字，被其师爷看到了，用笔一勾，更换成了“臣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未见增减一字，只是词序略加变动，语义便大变了。

在现代汉语应用中，这种一个词序颠倒就导致含义发生重大改变的

① 刘泽荣：《俄汉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54.

情况也不鲜见。以“语言”和“言语”为例，在英语里，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是两个内涵不同而且界限分明的单词，但转移到汉语里，就出现了麻烦，究竟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汉语语言学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

麻烦倒还不在于这种词序变化会导致意义变化，而在于这种词序变化和意义变化之间，几乎没有规律可循。具体地说就是：有时是词序变化而语义大变；有时词序变化了而语义并不发生变化，或者即使有变化，却未必值得研究。例如，“演讲”和“讲演”，“辩论”和“论辩”，就是比较明显的词序颠倒，但是我们很难说这当中的语义已经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如此观之，汉语被西方人认为是“很难懂的东西；不可解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被挑剔出种种不足与缺陷，确实可以理解。因此，我们同样不难理解，仅从其应用形式的角度来考察，在交际实践中，汉语显然有着和拼音文字不同的应用规律和语用规则。

二、关于汉语构成的两大特点的再思考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谁总结出多少条“汉语的不足与缺点”，他都无法否定汉语绵延数千年，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充满活力的适应能力、表现能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这一事实。就以那位一百多年前批评汉语的史密斯先生而言，他在对汉语作出上述的批评之后，随即也写下了非常客观的评价：“我们并不是抱怨中文不能传达人类的思想，也不是说，人类的一大部分思想，很难或不可能用中文阐述清楚……”^①

很显然，史密斯对汉语的批评，似乎只是被局限在语法理论的范围之内，而对于汉语的交际功能，他不但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批评意见，甚至可以说，他从语法角度对汉语提出的批评，又从交际角度（包括语义角度）进行了淡化。

这就不得不推动我们更深一步地思考：汉语既然从语法理论的角度来检查，有着如此之多的“不足与缺点”，但是，为什么在“表达人类的思想”的适应能力、表现能力方面，即语言的实际使用方面，却又没有无法表现的遗憾呢？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过程中“会导致智力混沌”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了。例如，汉语的诸多不足与缺

^① [美] 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气质. 张梦阳, 王丽娟译.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点，在实际使用中，是如何得到补偿或完善的？以上文字中谈及的汉语两大使用特点，是否属于“不足与缺点”？国内学者其实也一直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例如，季羨林先生就说过：“最近几年，我才豁然顿悟，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同中国的汉语不是一码事，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而东方的，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基本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表现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西方与中国的语言差异，在中国首先是汉语。”^①

应当看到，季羨林先生的这一“顿悟”是非常深刻的，也达到了一定高度的理论水平。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恐怕还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内在原因。有一位哲人说得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理，一个民族的语言构成必然以适应该民族生存特点的最佳方式为原则。

以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明显的差异：

第一，当时的西方世界，蒸汽机和电力的使用给它带来了现代化的变革，这一变革给日常话语带来的明显变化之一，就是在时间刻度和空间距离等诸多方面表达上的精确化。例如，当时西方人在时间表达上已经精确到“秒”，华夏帝国却还在古老文明中昏睡，以12个时辰来分割一天就已经足够应付日常交际；此外，西方在空间距离表达上已经精确到“厘米”，甚至更小的计算单位，但是在古老的中国，尤其是农村，仍然在用“里”作为距离的计算单位，而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每一里的实际长度又是不同的。以这两个方面和西方相比，汉语交际在表达方面显得模糊混沌，也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分”、“秒”等时间单位或“米”、“厘米”等长度单位以其高精度度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以至国人的用语也随之发生变化时，我们究竟应当认定是汉语本身发生了从“模糊混沌”到“明晰精确”的革命性变化，还是应当认定是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进行了根本的变化，而汉语只是及时跟着进行了适应性调整呢？显然，答案只能是后者。

17世纪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中写到，鲁滨逊因海上落难，一个人在荒岛上过了多年的“在木头上刻一道痕”来代表一天的孤单生活。虽然后来他救了一个土人当仆人，但初期交流也只局限于手势动作，即使到后来也多为单词、简单句。我们看到，鲁滨逊原本也是来自文明世界的人，他置身于荒岛二十多年，语言

①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季羨林序.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10.

能力迅速退化（与其个人生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但是，我们能根据身处荒岛的鲁滨逊的英语使用情况，嘲笑英语“会导致智力混沌”吗？当然不能。

因此，史密斯先生根据东西方由于科技水平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日常生活方面的表达差异，认定汉语“会导致智力混沌”这一结论显然是有失准确的。

第二，西方世界起步较早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选择流动较大的生活方式。因而在西方的语言构成中，显然比较重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在与原本陌生的人群的关系）的调整，在这一方面，其语言表现及语法规则是清晰明确的（例如，非常强调话语行为中的主宾关系）。而中国是一个宗法制度渊源深远的社会，尤其是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有着家族、宗族等聚族而居的传统，与其相应的汉语交际，很自然地就会重视显现人际关系中的亲情度及其判定依据。

各民族的语言其实是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的。在西方语言中，某些至关重要的语法规则在汉语中没有或者显现得相当模糊，而在汉语中显现得相当明确的人际关系中的亲情度，在西方语言中同样也存在着“模糊”甚至“混沌”的情况。

我们不妨举两个表现亲情关系的用词：一个是“外婆家的表姑奶奶的侄孙女婿”，另一个是“奶奶的娘家侄媳妇的二舅妈”。不难想象，在使用汉语的人群中，即使是农村的文盲老太太，也能够把此类关系排列得明明白白。但是，如果将这一类的例子转到西方语言中，让欧美人士用其本土语言进行表达，不仅要大伤脑筋，只怕最后还是难免“一脑门子糨糊”。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又是不是应该因此就认为某个民族语言连如此简单的人际关系都不能表达清楚，于是就用“这样一种文字，这样的语言结构，就像夏季的炽热要引起午后的昏睡一样，会导致智力混沌……”的言论对该语种反唇相讥呢？

顺应这一思考方式，不难想到，我们原本就不应当简单地以某一种民族语言的使用规则去评价另一种早已发展成熟的民族语言，而且，评价一种民族语言的构成与应用也不应当以单一的语法为标准。

对于如何评价某一种民族的语言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与如何评价某一个人的个性特点一样，有一个如何切入评价角度的问题。例如评价一个人，在某一场合中，我们认为他表现出的是“果敢、有决断”，但是换一个场合，同样的表现很可能就会受到“固执、不虚心”的批评；在某一场合中受到的“平易、随和”的夸赞，换一个场合，

很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是“没有主见、软耳朵根子”。对于语言（包括言语）的评价，其实也是一样，从某一角度来看是缺点，可是转换到另一个角度，缺点很可能就成了优点。

多年来，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在认读和书写方面显得更为简便快捷，这似乎早已成定论。然而，从计算机的应用输入角度来评价，方块汉字的输入速度比拼音文字快捷，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钱冠连先生在其《汉语文化语用学》中提出的“对语言进行多角度评价”的观点非常重要。他在书中写道：“胡裕树先生所指出的：‘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又有胡附、文练认为‘语序所表达的，有的属于语义，有的属于语法，有的属于语用。’他们还指出：‘必须认识到造句手段（如语序、虚词等）所表达的内容有语义的，有句法的，还有语用的。’‘必须区分一般主语（陈述对象）与话题主语（脱离句法控制的说话焦点）。’”^①

这告诉我们，对于汉语的评价，至少应当通过“语义的、语法的、语用的”这三个角度的综合考察。如果我们将上文所谈及的第一个特点，即“通过词序以及单词内部字序排列的变化来调整语义”看作从语义角度得出的结论，将第二个特点，即“汉语的单词在使用中，没有主宾格、比较级等语法方面的变化规则”看作从语法角度得出的结论，那么，我们还应当再从语用角度对汉语进行一番考察。

如果经过综合考察，所得结论与上述两点没有冲突，那么这个“不足与缺点”就是无可争议的了。但是，如果转换考察角度后，原结论也随之发生变化，那么这个“不足与缺点”可能不再是不足与缺点，而应称之为“特点”。这个“特点”甚至还可能被看作优点。

第二节 汉语交际研究首先应当选准切入角度

汉语之所以在语法方面有很多不足，却仍能充分显现出适应能力、表现能力和绵延数千年的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一种优秀的语言，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汉语在使用中与语境紧密贴近，并时时注意从语境中吸取信息补偿。

^①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49 ~ 250.

一、切入角度改变，研究结论也就随之改变

要想在汉语被历数如此之多“不足”的背景下，论证汉语是一种“优秀的语言”，就需要调整考察角度、选准切入角度。

关于这一点，我们仍不妨顺应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中所举的“Ta打Ta”的那一则例证，再举一个相类似但更为经典的例证。

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中，曾写到这样一件事情：

宝玉房里有一个小丫鬟，名叫小红。有一次，在大观园里，她迎面碰上王熙凤，王熙凤恰逢身边无人，就随口叫小红替自己去向平儿传个话。不一会儿，小红回来了，向王熙凤汇报时说了这么一番话：“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几丸延年神验万金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奶奶带了去。’”小红在向王熙凤说这一番话时，王熙凤身边多了一个对原先情况不了解的李纨。李纨当场就被小红的这一番话弄糊涂了，笑道：“哎哟，这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

如果说上面史密斯先生的那则“Ta打Ta”的话语实例，是外国人依据汉语的应用特点“虚构”出来的，那么，上面这段来自汉语经典作品、经过作家精心加工后的话语就是汉语语法规则“缺这少那”的如山铁证了。何况现场就没有听懂这番话的人证——李纨！

但是，重要的问题其实在于，小红的这段话原本是对王熙凤说的，作为交际对象的王熙凤是不是也同样糊涂了呢？事实是，王熙凤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小说中写到，见李纨听不明白小红的话，“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接着，又当着小红的面向李纨夸赞小红：“这个丫头就是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儿就很剪断。”随即王熙凤又转向小红：“明儿你服侍我吧，我认你做干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果然第二天，王熙凤就去向宝玉要来了小红，而小红仅仅因为向偶尔使唤自己的王熙凤在回话时说了这么一番话而受到赞赏，就从原先在宝玉房里烧烧水、浇浇花，连宝玉的房间都不可以进去的地位最低的小丫鬟，一跃而至王熙凤的身边，受到了重用。显然，王熙凤不但认为小红的这番话说得非常清楚明白，而且有此